

## 中国城镇已婚妇女就业对其生育状况的影响研究

周宇香<sup>1</sup> 宋健<sup>2</sup>

(1. 中国人民大学 社会与人口学院,北京 100872;

2. 中国人民大学 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北京 100872 )

**[摘要]** 文章利用2010年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基于新家庭经济理论,分析了中国城镇已婚妇女就业对生育的微观影响,同时检验了个人资本(受教育程度和户口性质)和经济支持(丈夫收入)的调节作用。分析结果发现:城镇妇女的就业对其生育(生育数量和初育年龄)存在消极影响;总体上个人资本会增强妇女就业对生育的消极作用,但经济支持的调节作用并不明显。研究还针对妇女生育与就业的矛盾及未来政策着力方向进行了讨论。

**[关键词]** 已婚妇女;就业;生育

**[中图分类号]** C92-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1613 (2017) 01-0058-10

### 一、研究背景和文献

2016年中国开始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这是继2013年国家启动实施单独二孩政策后的又一次人口政策调整。在此政策背景下,家庭是否会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生育二孩,不仅广受社会各界关注,而且是影响未来政策走向和人口发展的重要问题。

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人口学对中国生育行为的研究偏重于生育政策对生育行为的影响(杨菊华,2007),但随着全面两孩政策的实施,人们的生育选择空间变大,要摸清家庭的生育决策机制,研究除了生育政策之外的影响因素就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从微观上来看,个体的受教育程度、社会地位、收入水平、职业状况等各类社会经济因素都会影响其生育决策,特别是在妇女普遍参与劳动的现代社会中,妇女就业会提高其生育成本,从而可能会对其生育行为产生消极影响。

近几十年来,随着工业化的不断发展,发达国家的妇女就业参与率不断提高,同时时期总和生育率持续走低,降至更替水平之下,学界一般认为妇女劳动参与率的不断提高促进了生育率下降(Matysiak&Daniele,2008),在发达国家,妇女就业参与与生育之间存在较为稳定的负向关系(Hoffman,1985;Jones,1981;Osawa,1988;Calhoun,1989)。有些研究区别了孩子数量与质量(Becker,1960;Becker&Lewis,1973;Willis,1973),认为收入增加会使得人们更偏好孩子的质量,从而降低了生育率;还有一些学者则研究了妇女时间分配决策,强调了妇女时间的机会成本(Mincer,1963;Becker,1965;Willis,1973),妇女工资增加会对孩子的需求造成消极影响。但自1980年代起,妇女就

**[基金支持]**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出生性别比失衡的生育选择机制研究》(15BRK010)。

\* **[收稿日期]** 2016-10-09

**[作者简介]** 周宇香,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博士研究生。宋健,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导。

业参与率极高的欧洲国家生育率开始回升，生育率与妇女劳动参与率的负关系开始逐渐减弱，甚至转为正相关 (Ahn & Mira, 2002; Rindfuss, Benjamin & Morgan, 2003; Brewster & Rindfuss, 2000)。

在微观研究中，一般也认为妇女就业会对其生育行为产生消极影响。工作的妇女的生育意愿比无工作的妇女更低 (Pratt & Whelpton; 1956; Whelpton, et al; 1966)，并且喜欢工作的妇女的意愿孩子数比为了获得收入而工作的妇女要少 (Whelpton, et al; 1966; Ryder & Westoff, 1971)，工作参与对生育的影响是负向的。也有研究对就业与生育在微观层面的负相关结论提出了挑战。在瑞典、意大利、美国、日本、以色列等国家，有研究发现妇女就业对生育的影响并不明显 (Cheng, 1996, 1997; Berinde, 1999; Santow, 2001; Bernardi & Nanio, 2005; Ekert & Stier, 2009)；在匈牙利和东德地区则发现，妇女就业对生育有明显的积极影响 (Kreyenfeld, 2004; Róber & Bukodi, 2005)。

现有研究关于妇女就业与其生育的关系发生变化的原因解释可归纳为三种：一是与社会文化有关，社会对于妇女就业的态度发生了改变，对于妇女的角色有了新的认识，性别平等进一步发展；二是平衡家庭和工作的社会政策增多，特别是儿童照料服务更易获得；三是妇女工资提高，更容易购买到儿童照料服务。这些社会背景的变化使得生育与妇女就业之间的矛盾性变小，因此改变两者关系的并非时间，而是国家间的异质性和一些不可测量的变量。不同的社会经济文化背景会产生不同的效果，在控制了儿童照料和妇女失业率和对由生育推迟引起的生育率失真进行调整后，TFR 和妇女劳动参与率就会恢复负相关关系 (Tomas Kogel, 2006)。

上述异质性主要是由于社会制度、社会政策、儿童照料服务可获得性、就业环境等因素影响生育与就业关系而导致的，另外妇女人力资本、妇女年龄、已有孩子情况、丈夫收入等个人或家庭因素也会影响两者的关系，可见若要解释清楚两者关系需要建立一个较为复杂的逻辑系统，特别是在微观层面上。我国学界也有一些学者认为就业对我国妇女生育存在消极的影响 (胡静, 2010; 叶文振, 2014; 郑真真, 2015)，但这些文章多为定性讨论，定量分析相对较少，把妇女就业作为自变量而非控制变量进行分析的研究相对更少。若能利用数据对两者的关系进行研究，寻找两者互相作用的微观逻辑关系，探寻社会宏观背景中不同因素对两者关系的作用，对于我国完善生育政策，建立利于妇女按照政策生育的社会环境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 二、理论与假设

已婚妇女作为一个家庭成员，其就业或生育不仅是个体行为的选择，更是家庭集体决策的结果。但由于社会对性别角色传统认定的存在，对于女性来说工作和家庭是相互矛盾的 (Coser, 1974; Walsh, 1995)。随着社会的发展，妇女受教育水平、就业机会和性别平等程度不断提高，妇女就业参与程度也逐渐提高，但妇女经济角色的改变并没有对妇女的家庭角色产生太多影响，妇女仍旧是家庭中承担家务劳动较多的人 (Gornick & Meyers, 2003; Stier & Lewin-Epstein, 2007)。

微观经济学理论强调经济因素对家庭生育的影响，认为当家庭决定是否生育时会考虑家庭所拥有的资源、时间和生育的经济成本和机会成本等 (Becker, 1960; Becker & Lewis, 1973; Hotz et al., 1997; Willis, 1973)。因此在解释生育决策时，人们会考虑收入效应。妇女就业会增加家庭的总收入，有助于提升孩子的数量和质量，但收入增加并不一定实际导致家庭规模的扩大，因为生育更多的孩子会占用家庭 (特别是妇女) 的时间和精力，这时孩子对于家庭来说就是“昂贵”的。

家庭需要进行决策,为了保持现有的生活水平调整生育数量(数量质量替代效应)(Becker, 1965, 1981),还是牺牲现有的生活质量进行生育。这个决策过程可用合作博弈模型中的纳什议价理论来模拟(Nash Bargaining Theory)(Manser & Brown, 1980; McElroy & Horney, 1981)。夫妻双方商讨孩子效用和妇女工作效用的分配过程。妇女就业是一个“威胁点”,夫妻双方通过协商来进行家庭生育决策:妇女就业可提高家庭收入,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养育孩子的成本提高,孩子的效用相对减小,因此妇女就业对家庭生育会造成消极影响,家庭可能为了保持现有的生活水平减少生育数量或推迟生育年龄;妇女的个人资本(受教育程度、户口性质)会影响就业对生育的作用过程,个人资本越高,妇女放弃工作进行生育的可能性越低;丈夫收入越高,家庭的生活质量越高,多生育所需付出的经济成本和机会成本也会随之增加,孩子所能够给家庭提供的效用就会小于家庭抚养其的成本,家庭决策可能就倾向于追求高生活质量而放弃多生育。但如果丈夫收入达到一定的高度,增加生育对其家庭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减小,这时家庭可能会倾向于多生育;虽然丈夫收入对于家庭生育可能存在负向影响,但对妇女就业与生育的作用过程中,丈夫收入的增加则可减小妇女就业与生育之间的矛盾性。

上述分析思路可用图1表示,并提出以下假设:假设1 就业会推迟妇女的初育年龄;假设2 就业会减少妇女的生育数量;假设3 受教育水平越高,妇女就业对其生育状况的消极影响越大;假设4 非农业户口的妇女就业比农业户口的妇女就业对生育状况的消极影响大;假设5 丈夫收入越高,妇女就业对其生育状况的消极影响越小。

### 三、数据、主要变量与方法

#### 1. 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2010年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个人问卷数据进行分析。调查方法是按地区发展水平分层的三阶段不等概率抽样,最后回收个人有效问卷为29698份,有效回收率为99%。调查数据涉及了健康、教育、经济、社会保障、政治、婚姻家庭、生活方式、法律权益和认知、性别观念和态度等九个与妇女社会地位相关的内容,变量较全,不仅包括妇女生育和就业相关的内容,妇女的家庭(丈夫情况、父母情况)信息也较为详尽(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课题组,2011)。

#### 2. 主要变量及其操作化

本文研究的对象是中国城镇已婚育龄妇女(15-49岁),并着眼于妇女的生育状况。鉴于大多数已婚妇女生育1孩或2孩(样本中城镇已婚妇女的平均生育数量为1.18个,一孩比例为74.99%,二孩比例为18.89%,没有生育和生育3孩及以上的比例分别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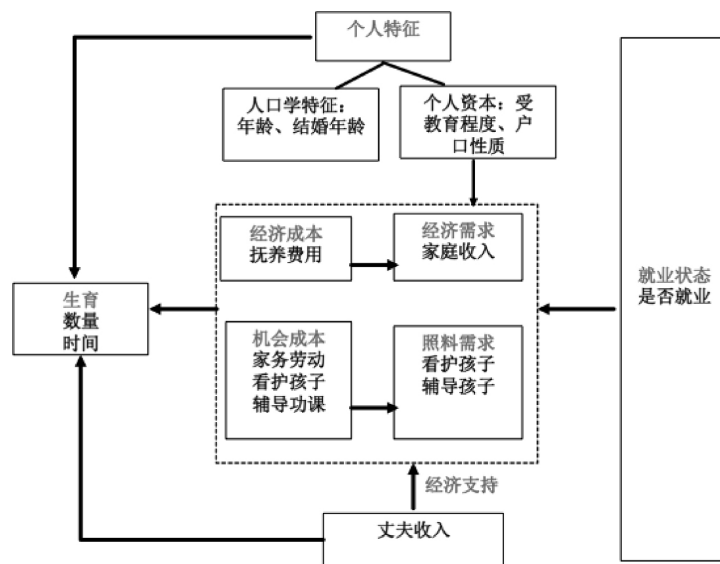


图1 研究框架图

4.82%、2.29%)，为简化模型和在全面二孩政策实施背景下更具政策参考意义，本文仅以生育了一孩和二孩的城镇妇女作为关注对象，有效样本数为 4275 个。因变量为生育数量和初育年龄，生育数量处理为虚拟变量，生育二孩为 1，生育一孩为 0，即可理解为是否生育二孩。

就业则是一个较为复杂的概念，特别是在城市地区，城市妇女的职业发展是个内涵丰富且难以定义的概念（佟新，濮亚新，2001）。一般来说，劳动供给的测量指标主要包括两种类型：一种是参与类变量，这类变量一般使用二分变量的计量方法；另一种是时间类变量，一般使用 OLS 模型（郭晓杰，2012）。本文的就业主要指“妇女生育前是否就业”由问卷中“您是多大年龄开始工作/务农的”和“第一个孩子出生时母亲的年龄”来判断获得。衡量个人资本的变量为户口性质（虚拟变量）和受教育程度（定序变量），经济支持为丈夫的月工资收入（连续变量），由“去年劳动收入（含工资奖金、津贴补贴、经营性收入和农林牧渔收入等）”除以 12 个月获得。控制变量中则包括年龄（连续变量）、初婚年龄（连续变量）。

### 3. 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采用多元 logistic 回归和多元线性回归进行分析，在有控制的条件下检验特定自变量的影响。为了避免量纲不同、自身变异或者数值相差较大所引起的误差，在进行回归分析时采用了标准化处理，得到的各回归系数可直接比较其对因变量的作用大小。主要变量的描述统计结果见表 1：

表 1 主要变量的描述统计

	样本量	百分比/均值
生育前就业状态		
在业	3522	82.39
不在业	753	17.61
子女数量（个）		
1	3206	80.74
2	765	19.26
年龄（岁）	4275	38.04
初婚年龄（岁）	4275	23.64
初育年龄（岁）	4040	25.10
户口性质		
农业	821	19.21
非农业	3453	80.79
丈夫月收入（元）	4159	2476.04
受教育程度		
小学及以下	400	9.36
初中	1455	34.04
高中	1304	30.50
大专及以上	1116	26.11

## 四、实证分析结果

### 1. 描述统计

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实行，该数据中的中国城镇已婚妇女生育数量主要分布在 1 个（74.99%）和 2 个（17.89%）之间（见图 2）。已婚却未生育的妇女比例仅为 3.97%，生育三个及以上孩子的妇女比例也极低（2.29%），说明我国处于已婚状态却选择不生育和选择多生育的妇女较少，也表明本文选择已婚妇女来研究生育与就业关系较为合理，而细化到选择生育 1 孩和 2 孩的妇女则更具政策参考意义。以下分析主要考察具有不同社会特征的妇女生育 1 孩和 2 孩的情况。

从本文主要考察的自变量——生育前的就业状况看，我国城镇地区妇女在生育前在业的比例高达 82.39%，不同就业状况的妇女生育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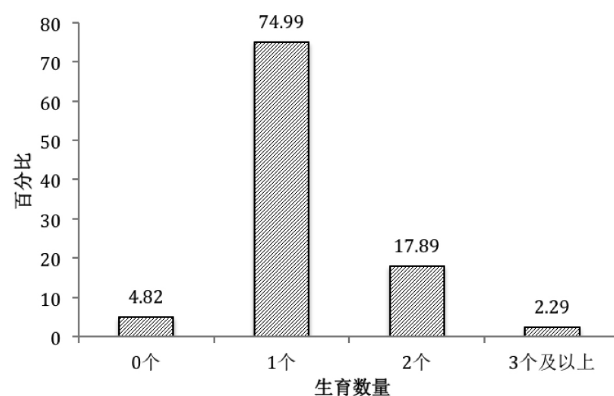


图 2 2010 年城镇已婚妇女生育数量分布 (%)

量上存在显著差异(见表2):不在业的妇女生育1孩的比例为65.29%,生育2孩的比例为34.71%,但在业的妇女生育2孩的比例仅为16.07%,要远低于不在业妇女生育2孩的比例,其生育1孩的比例则高达83.93%。在业的妇女平均初育年龄(25.24岁)也略高于不在业的妇女(24.75岁)。

生育二孩的妇女比例随妇女的年龄呈现增加态势(见表3)。不同年龄妇女的初育年龄并无太大差异,除了24岁及以下的妇女因为其自身年龄的原因初育年龄较低外,其它年龄组基本维持在24-25岁,其中35-39岁组的初育年龄最高,为25.63岁。

已婚妇女的受教育程度越高,生育1孩比例越高,2孩生育越少,初育年龄越高(见表4)。受教育水平处于小学及以下的城镇已婚妇女生育一孩的比例只有49.43%,而生育2孩的比例为50.57%,初育年龄为23.56岁;受教育水平为初中的妇女生育一孩的比例提高到了72.93%,大专及以上学历受教育程度的妇女生育一孩比例高达93.50%,而生育二孩比例仅为6.50%,初育年龄推迟到了26.44岁。

不同户口状况的城镇已婚妇女的生育数量和初育年龄也存在显著差异:农业户口的妇女生育2孩的比例为40.98%,但非农业户口的妇女生育2孩的比例只有14.33%;农业户口的妇女初育年龄为23.79岁,非农业户口则在此基础上推迟了1.63岁(见表5)。

综上所述,受教育程度高、非农业户口、生育前在业、年龄小的妇女生育2孩的比例要更少,且经过相关性检验后上述变量间都显著相关;且受教育程度越高、非农业户口、生育前在业的妇女初育年龄也可能越晚。

## 2. 模型结果

### 2.1 妇女就业状态对其生育数量的影响(见表6)

样本中就业的妇女生育二孩的比例是16.07%,不就业的妇女生育二孩的比例为34.71%,且这两者存在显著的差异。妇女的就业状态与妇女目前的生育数量的回归结果显示,在不考虑交互

表2 2010年我国不同就业状况城镇已婚妇女的生育数量和初育年龄

是否在业	生育数量(%)		初育年龄(岁)
	1个	2个	
不在业	65.29	34.71	23.78
在业	83.93	16.07	25.37

表3 2010年分年龄我国城镇已婚妇女的生育数量分布和初育年龄

年龄	生育数量(%)		初育年龄(岁)
	1个	2个	
24岁及以下	98.67	1.33	22.20
25-29岁	89.39	10.61	24.33
30-34岁	84.67	15.33	25.49
35-39岁	81.36	18.64	25.63
40-44岁	77.31	22.69	24.84
45-49岁	75.66	24.34	25.07

表4 2010年分受教育程度我国城镇已婚妇女的生育数量分布和初育年龄

受教育程度	生育数量(%)		初育年龄(岁)
	1个	2个	
小学及以下	49.43	50.57	23.56
初中	72.93	27.07	24.45
高中	87.78	12.22	25.23
大专及以上学历	93.50	6.50	26.44

表5 2010年我国不同户口城镇已婚妇女的生育数量和初育年龄

受教育程度	生育数量(%)		初育年龄(岁)
	1个	2个	
农业	59.02	40.98	23.79
非农业	85.67	14.33	25.42

表 6 城镇妇女就业状态与是否生育二孩的 logistic 回归结果

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是否就业 (否=0)	0.50***	0.79	0.79	1.55
受教育程度 (小学及以下=0)				
初中	0.57***	0.71	0.56***	0.56***
高中	0.29***	0.43***	0.28***	0.28***
大专及以上	0.21***	0.66	0.21***	0.21***
年龄	1.07***	1.07***	1.07***	1.07***
初婚年龄	0.85***	0.85***	0.85***	0.85***
户口 (农业=0)	0.38***	0.38***	0.61**	0.38***
丈夫月收入对数	0.41*	1.13**	1.13**	1.26**
丈夫月收入对数 <sup>2</sup>	1.07**			
受教育程度*是否就业 (小学及以下*是否就业=0)				
初中*是否就业		0.69		
高中*是否就业		0.53*		
大专及以上*是否就业		0.23***		
户口*是否就业			0.54**	
丈夫月收入对数*是否就业				0.85
常数项	1.88***	1.38	1.29	1.86***
Pseudo R-squared	0.16	0.16	0.16	0.16

注：\*\*\* p<0.01, \*\* p<0.05, \* p<0.1

效应的情况下，两者显著相关，就业的城镇妇女不太可能生育二孩（见表 6 模型 1）；受教育程度越高、初婚年龄越晚、非农业户口的城镇妇女更不可能生育二孩；年龄越大的妇女越有可能拥有二孩；学界一般认为收入对生育数量的影响是非线性的，因此模型中加入了丈夫月收入对数的二次项，通过模型 1 的结果可见丈夫月收入对妇女是否生育二孩的影响呈“U”型结构，丈夫收入较低和收入较高的家庭越有可能生育二孩，丈夫收入处于中间层次的家庭反而不太可能生育二孩。

表 6 的模型 2-模型 4 分别加入了受教育程度、户口、丈夫月收入对数与妇女就业状态的交互项，考察个人资本和经济支持对妇女就业与生育关系的作用。从个人资本来说，受教育程度处于初中及以下的妇女就业对生育并无明显影响，发现对于受教育程度为高中及以上的妇女，个人资本能够明显增强就业对生育的消极影响，即受过高中教育和大专及以上学历教育的妇女，其就业对于生育的消极影响要大于受过小学及以下教育的妇女；非农户口这一身份也能明显增强妇女就业对生育的消极作用，即拥有非农户口的妇女，就业的人群比没有就业的人群更不可能生育二孩。从丈夫的经济支持来看，虽然丈夫收入对妇女生育有显著影响，但其与妇女就业并不存在互动关系。

## 2.2 妇女就业状态对其初育年龄的影响（见表 7）

妇女的就业状态可能还会影响到其初育年龄。描述统计结果表明生育前处于就业状态的妇女平均初育年龄为 25.37 岁，而生育前没有就业的妇女平均初育年龄只有 23.78 岁，存在显著差异。回归结果显示就业会明显推迟城镇妇女的初育年龄，生育前就业的妇女的初育年龄比没有就业的妇女推迟了 0.21 岁（表 7 模型 1）；年龄越大、初婚年龄越大，妇女的初育年龄也越大；拥有非农业户口的妇女比有农业户口的妇女的初育年龄更晚；受教育程度为初中、高中的妇女与受教育程

表 7 城镇妇女的就业状态与初育年龄的多元线性回归结果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是否就业 (否=0)	0.21**	0.21**	-0.16	0.11	-0.34
受教育程度 (小学及以下=0)					
初中	-0.18	-0.18	-0.3	-0.17	-0.18
高中	-0.12	-0.12	-0.51**	-0.12	-0.12
大专及以上学历	0.22*	0.22*	-0.58**	0.22*	0.22*
年龄	0.01***	0.01***	0.01***	0.01***	-0.14*
初婚年龄	0.97***	0.97***	0.97***	0.97***	0.01***
户口 (农业=0)	0.24***	0.24***	0.23***	0.15	0.97***
丈夫月收入对数	-0.08**	-0.1	-0.08**	-0.08**	0.24***
丈夫月收入对数 <sup>2</sup>		0			
受教育程度*是否就业 (小学及以下*是否就业=0)					
初中*是否就业			0.22		
高中*是否就业			0.55**		
大专及以上学历*是否就业			0.98***		
户口*是否就业				0.11	
丈夫月收入对数*是否就业					0.07
常数项	1.89***	1.95	2.19***	1.97***	2.33***
R-squared	0.689	0.689	0.69	0.689	0.689

注：\*\*\* p<0.01, \*\* p<0.05, \* p<0.1

度为小学及以下的妇女的初育年龄相比并无明显差别，但是读了大专及以上学历的妇女的初育年龄相比于受教育程度为小学及以下的妇女的初育年龄明显推迟了 0.22 岁；丈夫月收入对数每提高一个单位，妇女的初育年龄能明显提早 0.08 岁，而且从模型 2 来看丈夫月收入对妇女初育年龄不存在非线性影响。加入个人资本（受教育程度、户口性质）和经济支持（丈夫月收入）与妇女就业的交互项后，发现受教育程度提高能够增强妇女就业对初育年龄的消极影响，受教育程度为高中的在业妇女比受教育程度为小学及以下的在业妇女的初育年龄推迟了 0.39 岁，受教育程度为大专及以上学历的在业妇女比受教育程度为小学及以下的在业的妇女的初育年龄推迟了 0.82 岁；但户口性质以及丈夫月收入在妇女就业对初育年龄的影响过程中并无作用。

## 五、结论与讨论

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中国城镇已婚妇女的就业状况对其生育总体上具有显著的影响，具体表现为：生育前就业会显著降低妇女生育二孩的可能性，并推迟妇女的初育年龄，假设 1 和假设 2 得到验证。个人资本，包括受教育水平和户口性质在大多数模型中与妇女就业状况的交互是显著的：对于学历较高的妇女（高中及以上），受教育程度能够明显增强就业对生育（是否生育二孩和初育年龄）的消极影响，但对于学历较低的妇女（初中及以下），这一作用过程并不显著；非农户口身份能明显增强妇女就业对生育二孩的消极影响，但在妇女就业与初育年龄的影响过程中没有发生作用，假设 3 和假设 4 被部分验证。经济支持（丈夫的收入）与妇女就业的交互作用在大多数模型中不明显：虽然丈夫收入对妇女的生育存在明显的作用，丈夫收入的提高会使得妇女初育年龄提前，丈夫收入对生育数量的影响则是非线性的，呈“U”型，即丈夫收入较低和较高的家

庭较可能生育二孩，而丈夫收入处于中等水平的家庭生育二孩的可能性反而较低。但丈夫收入在妇女就业与生育的作用过程中影响并不明显，假设 5 未被验证。

以上分析可见个人资本在妇女就业状态对生育的作用过程中的调节作用较大，但丈夫的经济支持的调节作用并不明显。并且比较上述标准化系数比较可见，妇女的就业状态对其生育年龄的影响作用要远大于丈夫收入的作用，妇女的就业状态对生育数量的影响作用则要小于丈夫收入的作用。表明妇女家庭经济地位的提高能推迟其生育年龄，但在家庭生育决策中较为重要的生育数量上，还是丈夫的经济地位起到较大的影响。

假设 3 和假设 4 未得到完全验证及假设 5 未得到验证的主要原因可能是生育政策的差异影响，城镇中双独夫妇与其他类型夫妇的比例关系，以及由于人口流动所导致的城镇人口的生育意愿、劳动参与、就业性质间存在的较大差别，都会影响就业与生育的关系。即便如此，我们仍发现了个人资本的重要作用，特别是妇女的受教育程度能够增强就业对生育的消极影响，妇女受教育程度越高，其就业性质和收入可能越好，越不倾向于为生育而放弃就业。

由此可见，就业对中国妇女的生育时间和生育数量均存在负面的影响，且妇女受教育程度越高，这种负面影响越强。本文数据反映的还是一孩半政策背景下的情形，在全面两孩政策的实施背景下，妇女就业对生育的消极影响可能会更为突出，个人资本和来自丈夫的经济支持的调节作用也可能会更为明显。虽然社会经济发展和观念变化给了妇女在职场上更多显露头角的机会，但整体上妇女仍处于就业弱势地位，女性相对于男性出现了就业难、工资低的状况。妇女一方面需要承担照料孩子和料理家务的角色，另一方面在劳动力市场上需要与男性同样有突出表现（陈卫民，2002）。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发展，农村劳动力向非农部门转移成为了不可逆转的趋势，农村女性在劳动力转移的过程中相对于男性劳动力而言也要受到更多的限制，由于生育造成的就业中断会使得她们在就业市场中处于弱势地位（魏宁、苏群，2013）。在当前的劳动力市场下，女性就业地位本已低于男性，且 30 多年的计划生育使得城镇妇女生育一孩已成常态，若生育二孩的话不仅会使得家庭抚养成本提高，也会增加用人单位成本，使得妇女就业雪上加霜（杨菊华，2014）。因而生育政策调整使得妇女就业的性别劣势进一步扩大，因符合生育政策的职业女性可能会在产假、养育孩子等方面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这使得用人单位会重新考量雇佣成本和风险（宋全成、文庆英，2015），这就造成了妇女在选择二胎上的困难，当这种困难与其由于受教育程度提高对就业的主动选择双重叠加时，可能会造成整个中国生育率的持续偏低。因此，如何兼顾妇女的就业和生育，是未来社会政策要着力关注的问题。

#### [参 考 文 献]

- [1] 陈卫民. 中国城镇妇女就业模式及相关的社会政策选择——社会性别视角的分析 [J]. 中国人口科学, 2002 (1).
- [2] 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课题组. 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主要数据报告 [J]. 妇女研究论丛, 2011 (6).
- [3] 郭晓杰. 中国已婚女性劳动力供给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标准化系数研究方法 [J]. 人口与经济, 2012 (5).
- [4] 胡静. 收入、相对地位与女性的生育意愿 [J]. 南方人口, 2010 (4).
- [5] 宋全成, 文庆英. 我国单独二胎人口政策实施的意义、现状与问题 [J]. 南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5 (1).
- [6] 佟新, 濮亚新. 研究城市妇女职业发展的理论框架 [J]. 妇女研究论丛, 2001 (3).
- [7] 魏宁, 苏群. 生育对农村已婚妇女非农就业的影响研究 [J]. 农业经济问题, 2013 (7).



- [8] 叶文振. “单独二胎”生育政策的女性学思考 [J]. 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 2014 (12) .
- [9] 杨菊华. 中国的婚居模式与生育行为 [J]. 人口研究, 2007 (2) .
- [10] 杨菊华. “单独两孩”政策对女性就业的潜在影响及应对思考 [J]. 妇女研究论丛, 2014 (4) .
- [11] 郑真真. 从家庭和妇女的视角看生育和计划生育 [J]. 中国人口科学, 2015 (2) .
- [12] Ahn N, Mira P. A note on the chang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fertility and female employment rates in developed countries [J]. 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 2002, 15 (4) : 667-682.
- [13] Becker G S. 1965. A Theory of the Allocation of Time [J]. The economic journal, 1965, 75 (299) : 493-517.
- [14] Becker, G.S. A treatise on the family [M].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1981
- [15] Becker G S. An economic analysis of fertility [M] //Demographic and economic change in developed countries.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0: 209-240.
- [16] Becker G S, Lewis H G. O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Quantity and Quality of Children [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73, 81 (2) : S279-S288.
- [17] Brewster K L, Rindfuss R R. Fertility and women's employment in industrialized nations [J].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000, 26: 271-296.
- [18] Berinde D. Pathways to a third child in Sweden [J]. European Journal of Population, 1999, 15 (4) : 349-378.
- [19] Bernardi F, Nazio T. Globalization and the transition to adulthood in Italy [J]. Globalization, uncertainty and youth in society: The losers in a globalizing world, 2005: 359-385.
- [20] Calhoun C. Estimating the distribution of desired family size and excess fertility [J].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 1989, 24 (4) : 709-724.
- [21] Cheng B S. An investigation of cointegration and causality between fertility and female labour force participation [J]. Applied Economics Letters, 1996, 3 (1) : 29-32.
- [22] Cheng B S, Hsu R C, Chu Q. The causality between fertility and female labour force participation in Japan [J]. Applied Economics Letters, 1997, 4 (2) : 113-116.
- [23] Coser, L. Greedy Institutions [M]. Free Press, New York, 1974
- [24] Ekert-Jaffe O, Stier H. Normative or economic behavior? Fertility and women's employment in Israel [J].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2009, 38 (3) : 644-655.
- [25] Gornick J C, Meyers M K. Families that work: Policies for reconciling parenthood and employment [M].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2003.
- [26] Hotz V J, Klerman J A, Willis R J. The economics of fertility in developed countries [J]. Handbook of population and family economics, 1997, 1 (Part 1) : 275-347.
- [27] Hoffman E P. Fertility and female employment [J]. Quarterly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1985, 25 (1) : 85-95.
- [28] Jones E F. The impact of women's employment on marital fertility in the US, 1970 - 75 [J]. Population Studies, 1981, 35 (2) : 161-173.
- [29] Kreyenfeld M. Economic uncertainty and fertility postponement. Evidence from German panel data [C] //Presentation prepared for the Meeting of the Verein für Socialpolitik. 2005.
- [30] Mincer J. Market prices, opportunity costs, and income effects [J]. Measurement in economics, 1963: 67-82.
- [31] Matysiak, Anna & Daniele Vignol. Fertility and women's employment: A meta-analysis [J]. European Journal of Population/Revue européenne de Démographie, 2008, 24 (4) : 363-384.
- [32] McElroy M B, Horney M J. Nash-bargained household decisions: Toward a generalization of the theory of demand

- [J] .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1981, 22 (2) : 333-349.
- [33] Manser M, Brown M. Marriage and household decision-making: A bargaining analysis [J] .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1980, 21 (1) : 31-44.
- [34] Osawa M. Working mothers: Changing patterns of employment and fertility in Japan [J] .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1988, 36 (4) : 623-650.
- [35] Pratt L, Whelpton P K. Social and Psychological Factors Affecting Fertility. XXX. Extra-Familial Participation of Wives in Relation to Interest in and Liking for Children, Fertility Planning, and Actual and Desired Family Size [J] . The Milbank Memorial Fund Quarterly, 1956, 34 (1) : 44-78.
- [36] Rindfuss R R, Guzzo K B, Morgan S P. The changing institutional context of low fertility [J] . Population Research and Policy Review, 2003, 22 (5) : 411-438.
- [37] Róbert P, Bukodi E. The effects of the globalization process on the transition to adulthood in Hungary [J] . Globalization, Uncertainty and Youth in Society: The Losers in a Globalizing World, 2005: 177-2014.
- [38] Ryder N B, Westoff C F. Reproduc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1965 [M]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1.
- [39] Stier H, Lewin-Epstein N. Policy effects on the division of housework [J] . Journal of Comparative Policy Analysis, 2007, 9 (3) : 235-259.
- [40] Santow G. Deferment of the first birth and fluctuating fertility in Sweden [J] . European Journal of Population, 2001, 17 (4) : 343-363.
- [41] Tomas K?gel. Did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fertility and female employment within OECD countries really change its sign? [J] . 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 2004, 17 (1) : 45-65.
- [42] Tomas K?gel. An explanation of the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fertility and female employment across Western European countries [J] . Available at SSRN 995206, 2006.
- [43] Willis R J. A new approach to the economic theory of fertility behavior [J] . 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73, 81 (2) : S14-S64.
- [44] Whelpton P K, Campbell A A, Patterson J E. Fertility and family plann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M] . Princeton, NJ, 1966.
- [45] Walsh, E. Divided lives: The public and private struggle of three accomplished women [M] . Simon & Schuster, New York, 1995
- [46] 倪瑞萍. 广州市育龄妇女生育状况浅析 [J] . 南方人口.1994 (4)
- [47] 傅崇辉, 向炜. 深圳流动育龄妇女生育子女数的影响因素分析 [J] . 南方人口.2005 (3)

## The Effect of Married Women's Employment on Their Fertility in Urban China

ZHOU Yu-xiang<sup>1</sup> SONG Jian<sup>2</sup>

1. School of Sociology and Demography,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2. Centre for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Studie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effects of married women's employment on their fertility and examines the role of individual capitals (education and hukou) and economic support (husband income) in their fertility based on the data from the 3rd National Survey on the Status of Women in 2010 in the perspective of new home economics. The results show that women's employment has passive effects on their fertility and first birth age in the urban and individual capital tend to enhance the negative impacts of women's employment on their fertility rate while the economic support from husband is no clear significance on women's fertility rate. The implications of the finding on the relevant social policy are discussed to alleviate the contradiction of women's childbearing and their employment.

**Key Words:** Married Women, Employment, Fertility